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23.02.004

# “毛泽东诗词”概念外延辨正

陆智乐

(中山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毛泽东诗词”是毛泽东研究尤其是毛泽东诗词研究关涉的基础概念。然而,关于“毛泽东诗词”概念的外延至今仍存争论,未有定论。是否为“毛泽东本人”所作、是否为毛泽东“原创”、能否算作“诗词”、初稿和过程稿是否纳入、未经毛泽东定稿或同意发表的作品如何看待,是评判特定作品是否属于“毛泽东诗词”所要考虑的五个主要问题。对“毛泽东诗词”概念外延的理解是否准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能否基于毛泽东诗词开展客观严谨的学理研究,能否在新时代进一步推动毛泽东诗词的正面传播、阐释和运用。

**关键词:**毛泽东;毛泽东诗词;概念;外延

**中图分类号:**A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23)02-0023-07

作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毛泽东诗词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已在海内外引起极为广泛的传播和关注,由学界到民间亦产生了不计其数的研究成果和普及读物。然而,对于何为“毛泽东诗词”这一基本问题,至今却尚存争议,仍有探讨空间。关于“毛泽东诗词”概念的分歧主要不在其内涵而在其外延上。“毛泽东诗词”内涵,即“毛泽东创作的诗词”,但此内涵至少表征三个值得追问的外延问题:一是哪些诗词为“毛泽东本人”所作,二是哪些诗词为毛泽东“原创”,三是哪些作品为毛泽东创作的“诗词”。可以说,这几个问题至今仍未取得普遍共识。概念问题具有“元问题”的属性和地位,明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是一切判断、推理与论证合理的逻辑前提<sup>①</sup>。以毛泽东诗词为文本开展研究,理应厘清毛泽东诗词的外延,否则,就可能误将不属于毛泽东诗词的材料当作开展研究的凭据,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或者以讹传讹,在传播毛泽东诗词、毛泽东思想时贻误大众。

## 一 关于“毛泽东本人”所作的诗词

特定作品是否确为“毛泽东本人”所作,这是

学界在“毛泽东诗词”概念外延问题上的争论焦点。此问题与是否为“原创”、是否属于“诗词”两问题的根本区别在于,后两者牵涉“创作”“诗词”概念界定之松紧度,带一定主观性,而此问题之答案则以严谨周密的史实考据为支撑,具客观意义。因此,对于已考究清楚的作品,事实不容混淆;对于尚未确证是否出自毛泽东本人的作品,则须进一步研究,切忌妄下判断,草率结案。

首先,对于在毛泽东生前经其本人校订定稿并署名发表的诗词以及经由权威研究部门认定为毛泽东所作的诗词,理应维护毛泽东本人的作者地位。一些网站上谣传过一种说法,宣称《沁园春·雪》实为胡乔木手笔,意图借此诋毁毛泽东。实际上,该诗写于 1936 年 2 月,在 1945 年 11 月以后即广为流传,后又正式发表在《诗刊》1957 年 1 月号,早已家喻户晓,胡乔木则在 1964 年 10 月才开始填词,且明确表示此前“没有写过词”<sup>②</sup>。对于这个谣言,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等部门早在 2011 年就曾辟谣,但近年来该谣言还是通过一些非正规渠道继续传播和渗透。为此,2021 年 7 月 15 日,中央网信办会同中央党校等单位在中国网

收稿日期:2022-09-15

作者简介:陆智乐(1995—),男,广东肇庆人,博士生,主要从事毛泽东思想、中共党史党建研究。

①金岳霖:《形式逻辑》,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 页。

②《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93 页。

络诚信大会上再次严正辟谣,以正视听。对于像《沁园春·雪》这样经过毛泽东本人及多个权威部门确认其作者身份的作品,我们理应坚决维护毛泽东本人的作者地位,旗帜鲜明反对一切歪曲事实的谣言。另外,有部分被收进原中央文献研究室所编《毛泽东诗词集》的作品,由于系“根据抄件刊印”等原因,甫经发表就引起质疑。以《张冠道中》和《喜闻捷报》为例,一些学者从它们相关的地理、气候、人物、事件,抄件稿的由来,乃至格律等角度提出质疑,认为其并非毛泽东所作。参与编辑中央文献版《毛泽东诗词集》的吴正裕多次回应质疑,坚持认为二诗出自毛泽东之手,绝非伪作。对于双方的辩论,胡为雄指出,质疑方虽提出了一些合理意见,但“没有可靠的文字和史实依据,又不能提出这两首诗是他人所作的确切证据”,尚不能轻易判定这两首诗为他人所作<sup>①</sup>。笔者同意这一意见。原中央文献研究室是编研毛泽东诗词的权威机构,中央文献版《毛泽东诗词集》是现行诸种毛泽东诗词集中最权威的版本。尽管书中对个别诗词的收录缘由未作详尽解释,但除非有确凿证据,否则不宜轻易推断其误收他人诗词。此外,还有一些诗词如《读报》四首、《改鲁迅诗》等虽未编进中央文献版《毛泽东诗词集》,但被原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入《毛泽东年谱》<sup>②</sup>,亦可视作权威研究机构认定的毛泽东本人创作的诗词。

其次,对于权威研究部门明确证伪的作品,不予认定为“毛泽东诗词”。例如网传毛泽东未发表的“文革”诗词十七首,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档案馆新闻发言人就曾明确指出,这些诗词均为伪作。对此类打着所谓“解密档案”旗号,恶意杜撰欲加之于毛泽东名下的伪作,务必提高警惕,坚决抵制,划清其与毛泽东诗词的界限。

还有一些据传为毛泽东所作的诗词,未经权威研究部门官方证实或证伪,而是由学者细致考证后认定系毛泽东所作,并得到学界普遍认可。例如,吴正裕考证过据传为毛泽东重庆谈判期间

所作的《七律(有田有地吾为主)》一诗,他寻访发掘该诗的盛巽昌,从而看到了较早披露该诗的《大公报》和《立报》,进而对该诗的几个流传版本进行全面细致的比对,再结合自己曾向胡绳请教过该诗作者问题的回忆,得出结论——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确实创作了这首诗<sup>③</sup>。辨别毛泽东诗词真伪的重要方法就是对流传的诸版本作纵向溯源和横向比对,并且走访考察相关的人、事、物,吴正裕的考证颇具示范意义,受到学界的认可。这类经学者严谨考证后认定并得到公认的诗词,也具有较高可信度,有望被正式佚存。

再有一些诗词,例如《杂言诗·迎春》《五言诗·赞井》《五言诗·咏指甲花》等,即使它们未被权威研究部门明确证伪,但亦未经权威研究部门和学者个人严格考证为毛泽东本人所作。这些诗词多数源自相关见证人、知情人日后的单方面回忆,且无当年文献可据,难于考证,严谨起见,不宜轻易判定为毛泽东本人所作。

最后,还有一些据说是毛泽东与他人合吟而成的“联句”。例如,据萧子升、罗章龙回忆,他们都曾在青年时有过与毛泽东即兴联句的经历,留下了一些诗词<sup>④</sup>。这些“联句”用今天的话来说相当于“合著”成果,其中出自毛泽东的部分按理说可被认为是毛泽东本人的作品,但是,与前一类相似,这些作品主要见于当事人的相关回忆且多为孤证,非经严格考证,不宜轻易认定为毛泽东本人所作。

## 二 关于毛泽东“原创”的诗词

在是否“原创”这一问题上有待商榷的主要是毛泽东的“改诗”。这类诗词大致分为两种情况。其一是为他人创作的诗词润色修改。例如,陈毅曾将自己的七首诗寄给毛泽东请求斧正。毛泽东回信表示“只给你改了一首,还很不满意”<sup>⑤</sup>。在信中,这首经他改过的诗题为《西行》,而在《陈毅诗词集》中,该诗与陈毅的其他六首诗放在一

①胡为雄:《毛泽东两首五律诗真伪之辨议》,《毛泽东思想研究》2014年第1期。

②《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4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294、413页。

③吴正裕:《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创作的一首七律政论诗》,《党的文献》2016年第6期。

④萧瑜:《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20、76、90页;罗章龙:《亢斋汗漫游诗话(三)》,《湘江文艺》1980年第2期。

⑤《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

起,题为《六国之行》<sup>①</sup>。其二是因自我感怀言志而改。这里又细分两种情形,一是改动字数较少,主题思想与原作基本一致;二是改动幅度较大,主旨已与原作大为不同。前者如毛泽东离家前留给父亲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此诗原作与毛泽东抄改的虽每句都略有不同,但主旨别无二致<sup>②</sup>。后者则如毛泽东仿陆游《示儿》而改作的七绝:“人类今娴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鬻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sup>③</sup>

市面上一些毛泽东诗词选集将这些“改诗”收录进来,命名为《改陈毅〈西行〉》《改诗呈父亲》《仿陆游诗》等,有学者对这种做法提出异议。吴正裕、孙东升指出:“把给陈毅修改的诗也当作毛泽东的诗词创作,这是一种极不严肃的态度。”<sup>④</sup>龚育之也认为,仿改前人的诗词,“一般只能认为是游戏之作,不能算数的”<sup>⑤</sup>。

毛泽东为他人润色的诗词不能算作“毛泽东诗词”。否则,那些曾吸纳过他人修改意见的毛泽东诗词,也能算作他人的诗词了,这显然不合理。正所谓“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与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相较而言,毛泽东诗词的重要区别在于,诗词作品首先抒发的主要还是诗人作为生命个体的个人情志。一般来说,诗友间的切磋雅正,多着意于雕字琢词炼句,而非重新构思、改换主旨,因此“创作”意义十分有限。

因自我抒怀言志而改的诗词则要分别讨论。如果像所谓《改诗呈父亲》那样小幅改动前人诗作,主旨没有实质变化,抄写成分明显大于创作的,也不能算毛泽东创作的诗词。不过,这些小改或抄写的诗词毕竟寄寓着毛泽东的思想和情绪,算是“一种‘无声胜有声’的潜在政治表达和情感流露”<sup>⑥</sup>,可以作为研究毛泽东阅读史和诗路心迹

的参考。如果是大幅改动,像仿改《示儿》诗,第一、三句除步韵外没有一处相同;第二、四句改“九州”为“五洲”,改“家祭”为“公祭”,改“乃翁”为“马翁”,其思想主旨已从原诗的爱国主义上升至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和人类关怀,有实质性超越与突破,相当于在原诗基础上的再创作,可以视为毛泽东创作的诗词。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且不论“改诗”能否算“创作”,就“改诗”本身而言,其得以成立须有一个最起码的客观前提,那就是毛泽东确实改写过这样一首诗。有一首《咏蛙》诗,可谓是众多网传“毛泽东诗词”中流传度最广的作品之一。其最早见于1987年7月17日《羊城晚报》,被说成是毛泽东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期间所写的诗,诗云:“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sup>⑦</sup>后来有人指出此诗在历史上已有人写过,并非出自毛泽东<sup>⑧</sup>。然而,其非但没有从毛泽东诗词的行列剔除,反而作为毛泽东的改抄诗继续流传。甚至竟有人提出“同构”说,即毛泽东和前人分别独立写出了同样的内容。对此,龚育之指出,不论是何种说法,“都有一个前提,即毛泽东的确写过或抄过这么一首诗”,“现在这个前提并不落实”<sup>⑨</sup>。让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人还根据这首诗指责毛泽东必欲“凌驾群伦”“唯我独尊”,怀有“专制思想”“皇权意识”等等<sup>⑩</sup>。实际上,这类未能确认与毛泽东存在客观联系的作品本就不该作为其抄改的诗而传播。

### 三 关于毛泽东创作的“诗词”作品

诗词概念的多义性与歧义性、诗词呈现形态的层次性、诗词构成和派生要素的延展性等复杂情况的实际存在,使得一些情形在“算不算诗词”这一问题上需要加以辨明和讨论,主要有以下

①《陈毅诗词集(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642页。

②《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

③《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194页。

④吴正裕,孙东升:《当前毛泽东诗词研究中几种值得注意的倾向》,《党的文献》2001年第3期。

⑤龚育之:《龚育之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2年版,第113页。

⑥代红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深切忧思及战略应对——基于新中国成立后两次手书〈三垂冈〉的分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5期。

⑦徐秋良:《毛泽东〈咏蛙〉诗》,《羊城晚报》1987年7月17日。

⑧胡为雄:《〈毛泽东〈咏蛙〉诗〉证伪》,《毛泽东思想研究》2021年第1期。

⑨《龚育之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127页。

⑩何西来:《论艺术风格》,求真出版社2013年版,第197页。

五类。

一是“残句”。“残句”指没能完整存留下来的、目前只能读到个别片段的诗词。例如,据萧三之弟萧子风回忆,毛泽东在青年时写过一首七律:“骤雨东风过远湾,滂然遥接石龙关;野渡苍松横古木,断桥流水动连环。××××××,××××××。客行此去遵何路?坐眺长亭意转闲。”<sup>①</sup>诗的颈联由于记不起来已佚失了。那么,像这样的残句能否归入毛泽东诗词?大体来说,“毛泽东诗词”有四个层次的形态,一是毛泽东诗词的抽象整体;二是诗词集层面的毛泽东诗词;三是诗词篇层面的毛泽东诗词;四是诗词句层面的毛泽东诗词。“残句”虽不是完整的一篇,却可属诗词句层面的诗词。不过,“残句”往往还存在不好确定是否为毛泽东本人所作的问题。目前能落实这一前提的仅有经毛泽东本人明确回忆起的“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sup>②</sup>两句,应算作“毛泽东诗词”,而其余未经认定的残句则不宜贸然算入。

二是“联语”。对联与诗词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对仗本就是诗词的常用手法,尤其是律诗的“四联”中,颌联、颈联多为工整的联语。另一方面,一般认为,对联正是“从律诗演化出来的”<sup>③</sup>,与律诗一样有一定的节奏单位,也同样短小精悍。诗词楹联界亦有对联乃诗之精品、诗中诗一说。或许正因如此,有不少毛泽东诗词选集,也把毛泽东写过的部分对联收录在内;反过来,亦有一些毛泽东对联选编书籍收入了毛泽东诗词中对仗的句子。有学者认为,对毛泽东对联的研究和辑录“填补了毛泽东诗词研究的一项空白”<sup>④</sup>,“拓宽了毛泽东诗词研究的领域”<sup>⑤</sup>。但需要指出的是,对联和诗词本质特征不同,诗词有韵,而联语一般不押韵;另外,毛泽东虽在“作对”方面的造诣也很高,但其创作的对联在艺术性和影响力上尚不能与其诗词相比,故其创作的对联不宜归入

“毛泽东诗词”。

三是“韵语”。毛泽东写过不少带韵的短句,即“韵语”。这些“韵语”本是毛泽东所写的一些布告、题词、批语等,由于使用同韵字收尾,就成了“韵语”。例如,毛泽东为红四军司令部起草的布告“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sup>⑥</sup>;又如,他在1940年给《八路军军政杂志》题词“一面战斗,一面学习,百折不回,再接再厉”<sup>⑦</sup>;再如,1959年,他为一份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写的批语“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sup>⑧</sup>,等等。这些句子正是由于押韵,被一些编研者认为“亦可以当作诗来读”<sup>⑨</sup>而收入集中。然而,毛泽东是十分注重诗词格调和品位的,对自己的创作要求颇严,他曾谦虚地表示自己的作品“诗味不多,没有什么特色”<sup>⑩</sup>,同陈毅谈诗时又说“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否则就“味同嚼蜡”,还说“用白话写诗,几十年来,迄无成功”<sup>⑪</sup>。虽然这些“韵语”和诗词一样押韵,但大多诗味较淡,若将其算作“毛泽东诗词”,恐怕既会拉低毛泽东诗词的整体品质,也与毛泽东对自己诗作的一贯态度不符,故不宜将其纳入“毛泽东诗词”。同理,更不能将一些毫无诗意、甚至连韵语都不算的文字阑入毛泽东诗词集中。例如所谓《四言诗·奋斗》:“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四言诗·赠尼克松》:“老叟坐凳,嫦娥奔月,走马观花。”这些短句既无诗味,亦不押韵,实在不应冠以诗词之名。

四是“诗序”和“原注”。“诗序”是指作者写在诗词正文之前的小序,“原注”则是作者对某些作品原来就写有的注释。中央文献版《毛泽东诗词集》中,共有五首诗词正文前有小序,有四首诗

①萧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中国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50—51页。

②《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08页。

③王力:《诗词格律》,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4页。

④邓运山,邓美玲:《近年来毛泽东诗词研究综述》,《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

⑤蔡清富:《毛泽东诗词研究概观》,《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

⑥《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52页。

⑦《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64页。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页。

⑨胡国强主编:《毛泽东诗词疏证》,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46页。

⑩《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08页。

⑪《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334页。

词后附有作者原注。例如《送瘟神》的小序写道：“读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sup>①</sup>作者对人民生命健康的惦念之情和得知余江县消灭血吸虫后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在《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一词的原注中，毛泽东概述了共工怒触不周山的故事，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认为“共工是胜利的英雄”<sup>②</sup>。这些“前言后语”对于了解创作背景以及解读具体诗句是大有助益的，其虽不是诗词句，但与相应诗词的标题、正文等一同构成了诗词作品的整体，是这几首诗词的有机构成要素，编辑毛泽东诗词集时不应遗漏它们。

五是“诗论”。“诗论”即毛泽东关于诗词的议论。诗论不算毛泽东诗词作品，但有的毛泽东诗词集亦将诗论与诗作一同收入，附于诗作之后，并受到读者的欢迎。这当是由于诗论和诗作存在密切的相关性。诗论与诗作是互为表里的一对概念。一方面，诗论构成诗作的理论基础，诗作则是诗论的文学表现，这是诗作为“表”，诗论为“里”；另一方面，诗作抒情含蓄，而诗论说理明白，此则诗论为“表”，诗作为“里”。研究毛泽东的诗词应当熟悉其诗论，关注其文艺论述乃至其他论述，诗思互证，这样方能更加全面地体察作者的情志和思想，也才能更加准确地品赏毛泽东诗词的个中意味。

#### 四 关于毛泽东诗词“初稿”和“过程稿”

上述三个问题在共时层面上展开了讨论，问题所指涉的诗词文本是既成的，而若将视角切换至历时层面，那么诗词文本则是生成的。这就衍生出第四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毛泽东所写的诗词“初稿”和“过程稿”是否算入“毛泽东诗词”？对于经过作者修改的毛泽东诗词，目前市面上多数诗词集所收录的都是定稿或未定稿的最新稿，而非初稿和过程稿。例如，中央文献版《毛泽东诗

词集》中头一首词《贺新郎·别友》，就是经过不少改动后的定稿。该词有三个稿本，上阕第三句初稿为“惨然无绪”，过程稿为“满怀酸楚”，定稿为“苦情重诉”；上阕最后两句初稿为“曾不记，倚楼处”，过程稿为“重感慨，泪如雨”，定稿为“人有病，天知否”；下阕末四句初稿为“我自精禽填恨海，愿君为翠鸟巢珠树。重感慨，泪如雨”，过程稿为“我自欲为江海客，再不为呢呢儿女语。山欲堕，云横翥”，最后才定稿为“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sup>③</sup>。

毛泽东曾说过，“写文章和写诗不经过修改是很少的”，“有时，还要征求别人的意见，别人有不同意见我就要想想”<sup>④</sup>。如他所言，他习惯向郭沫若、臧克家等诗友请教诗词的修改问题，他的许多诗词在正式发表之前都经过字斟句酌，甚至，对于已经发表的作品，他仍继续修改，不断完善。小改如《菩萨蛮·黄鹤楼》改动过标点，《蝶恋花·答李淑一》改动过标题，《西江月·秋收起义》《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改动个别字词；大改则如《如梦令·元旦》《忆秦娥·娄山关》是改动整句，《念奴娇·昆仑》中“一截留中国”改为“一截还东国”，则更显情怀之崇高、胸襟之博大，使得全词的思想主旨和精神格调骤然升华。

“初稿”和“过程稿”作为毛泽东诗词“定稿”之前的历史形态，它们在“是否为毛泽东本人所作”“是否属于原创”“是否为诗词”这三个问题上都无异议，的确可算是名副其实的“毛泽东创作的诗词”。问题在于它们后来被改动了，因而暗含作者或多或少的否定态度，从尊重作者定稿的角度看，似不宜归入。但是，从研究的角度看，包括“初稿”“过程稿”“定稿”在内的各个版本都有其意义，都值得关注。“特别是毛泽东在正式发表前对某些作品的校改，更透露着诗人创作心境的变化或艺术追求的提升”，“梳理和辨析这些问题，显然是一个有待开发且大有可为的学术空间”<sup>⑤</sup>。正如国外学界曾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以最大的准确性有系

①《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页。

②《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1页。

③李晓航：《〈贺新郎·别友〉是如何定稿的？》，见郭思敏主编：《毛泽东诗词辨析》，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④《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5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84页。

⑤陈晋：《毛泽东诗词研究空间的新拓展》，见陈安吉：《毛泽东诗词版本丛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序言第2页。

统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精神遗产”<sup>①</sup>,中国学界也有必要和责任在将来编辑出版毛泽东诗词历史考证版,这将向人们展现诗人毛泽东丰富的思想和情感世界,为毛泽东研究尤其是毛泽东诗词研究提供可以凭借的宝贵材料。

## 五 关于“副编”诗词

“副编”问题与“初稿”和“过程稿”问题有一定相似性,同样值得注意。现行的毛泽东诗词集有不少参照了胡乔木主持编辑的《毛泽东诗词选》分设“正编”和“副编”。据胡乔木解释,正编“都是作者生前校订定稿的和正式发表过的”,副编则是“作者写成后都没有最后定稿”,“其中虽可能间或有因作者忘了,未及再看到和考虑修订的,但一般是作者所不准备发表,有些还明确表示过拒绝发表的”<sup>②</sup>。中央文献版《毛泽东诗词集》仍按此体例分正、副编,并加以补充说明:正编诗词都经作者校订定稿;副编新收十七首诗词大体分为两类,“一是由作者自己保存的曾经反复修改或审定过;二是作者写作后可能因忘记或手稿散佚而没有再修订的未定稿”<sup>③</sup>。由此看来,一些“副编”诗词是未经作者定稿的,有的还是作者不准备发表的,和诗词“初稿”“过程稿”一样,其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作者尚不满意的态度。

因此有人指出,对于确属作者所不满意并明确表示过拒绝发表的作品,最好还是尊重作者本人意见,不必收入集中<sup>④</sup>。据龚育之回忆,他也曾听许立群说,毛泽东曾表示不赞成出自己的全集,还援引郑板桥《后刻诗序》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sup>⑤</sup>。郑板桥在编定自己的《诗钞》后说:“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阑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sup>⑥</sup>在龚育之看来,只愿把自己改定后的精品佳作献予读者,“这是诗人对诗作的严肃态度,后人应当尊重的”<sup>⑦</sup>。

当然,《毛泽东诗词选》“副编”收入的八首诗

词和中央文献版《毛泽东诗词集》“副编”新收的十七首诗词,并非“平日无聊应酬之作”,其中不少还是公认的佳作,编者也为其作了严肃细致的编校工作,绝非“改窜阑入”。且这两本诗词选集均在出版说明中指出了正副编诗词的区别所在,体现了兼顾推进诗词传播和尊重作者意愿的实事求是态度。不过无论如何,“正编”和“副编”诗词之间客观存在着上述差别,这也是需要加以注意的。此外,对于那些毛泽东不愿意发表的诗词,他为何不愿发表,个中缘由也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

## 结语

综上,可对“毛泽东诗词”概念的外延作一总结:一是“毛泽东诗词”包括经由毛泽东本人确认并署名发表的诗词、由权威研究部门官方认定为毛泽东创作的诗词、由学者严谨考证确认为毛泽东所创作并得到学界公认的诗词,不包括经权威研究部门明确证伪过的作品、仅凭知情人单方面回忆而无当年文献可据又未被学界严谨考证确认为毛泽东所创作的诗词作品。二是上述“创作”指“原创”,包括经毛泽东大幅改动以致其思想主旨发生本质变化的“改作”,不包括毛泽东为他人润色的诗词,亦不包括毛泽东因抒怀言志而小幅改动的诗词。三是上述“诗词”包括诗词篇章,亦包括诗词句,诗词标题、序言、正文、原注等均是其有机构成部分,不包括联语、韵语、诗论。四是“毛泽东诗词”包括毛泽东诗词初稿、过程稿、定稿。五是正副编诗词间的差别应当加以注意,但二者都属于“毛泽东诗词”。

能否辨正“毛泽东诗词”概念的外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能否基于毛泽东诗词开展严谨客观的相关学理研究。毛泽东诗词不仅是透视毛泽东思想和生平的重要窗口,“也是我们认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向导”<sup>⑧</sup>。若不能明确毛泽东诗词的边界,就可能将一些伪作、他作或诗意不多

①聂锦芳:《关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历史考证版”》,《光明日报》2010年10月19日。

②《毛泽东诗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出版说明第1—2页。

③《毛泽东诗词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出版说明第2页。

④王浩天:《希望〈毛泽东诗词选〉有更完善的版本》,《光明日报》1990年5月24日。

⑤龚育之:《独特的视角 独特的魅力》,见陈晋撰稿:《诗人毛泽东》,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2页。

⑥王庆德注:《郑板桥诗文集注》,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第23页。

⑦龚育之:《龚育之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⑧曹应旺:《从毛泽东诗词看百年党史》,《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12期。

的作品阑入毛泽东诗词行列之中,由此形成的所谓毛泽东诗词注释本、鉴赏本、字帖本、谱曲本以及影音出版物等统统都只能是错上加错的产物,而若将其中的伪作或他作作为开展毛泽东研究乃至中共党史研究的凭据,得出的结论必是经不起推敲甚至是荒唐的。当然,从发展角度看,毛泽东诗词的外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新材料的发掘和考证工作的深入开展,获得认定的毛泽东诗词数量有望增加,但是,任何一首“毛泽东诗词”的佚存,都必须有严格的理据,尤其应当参照以上五个方面的标准,加以慎重考量。

能否辨正“毛泽东诗词”概念的外延,也决定着我们能否在新时代进一步推动毛泽东诗词的正面传播、阐释和运用。毛泽东诗词作为凝聚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传世经典,已经深深教诲和滋养了几代中国人,使广大人民群众从中领略了人民领袖、人民政党、人民共和国、人民军队的光辉形象。然而,学术研究和出版中的乱象影响了对毛泽东的科学评价<sup>①</sup>,一些具有“非毛化”倾向的历史虚无主义者,正是试图通过向毛泽东诗词发难,暗示或宣称毛泽东诗词水平一般、不合格律,认为毛泽东诗词只

会袭用前人诗句,更有甚者抓住“毛泽东诗词”概念外延不明朗这一点,企图混淆视听,造谣毛泽东的一些诗词是冒名顶替的他人之作,又或窜入伪作从而攻击毛泽东有“专制思想”云云。因此,清楚辨明哪些作品属于、哪些作品不属于毛泽东诗词尤为必要,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阻止别有用心之徒借改窜阑入毛泽东诗词大做文章,传播错误思潮。从正面看,去伪存真,实事求是地对“毛泽东诗词”加以甄别认定,也有利于维护毛泽东诗词的整体品质和形象。例如青年毛泽东的诗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虽是残句但流传甚广,曾被习近平在重要场合不止一次引用过<sup>②</sup>,这充分证明了毛泽东诗词的恒久魅力。然而,人们却未必知道这句诗出自毛泽东之手,现行多种毛泽东诗词集尚未将其收录或单列,有的只是在《沁园春·长沙》“击水”一词的注释中予以呈现。通过“毛泽东诗词”概念外延的辨正,为一些名副其实的“毛泽东诗词”正名,有助于使更多真正的毛泽东诗词为广大读者所了解、学习和接受,从而使毛泽东诗词的思想精髓和艺术魅力在新时代得到进一步彰显。

## On the Concept Extension of “Mao Zedong Poems”

LU Zhi-le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 Poems” is a basic concept related to the study of Mao Zedong, especially the study of Mao Zedong Poems. However, the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Mao Zedong Poems” is still controversial and inconclusive. Whether it is written by Mao Zedong himself, whether it is original by Mao Zedong, whether it can be regarded as poetry, whether the first draft and the process draft are included, and how to treat the works published without Mao Zedong’s finalization or consent are the five main issues to be considered in judging whether a particular work belongs to “Mao Zedong Poems”. Whether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xtension of the concept of “Mao Zedong Poems” is accurate or not largely determines whether we can carry out objective and rigorous theoretical research based on Mao Zedong Poems, and whether we can further promote the active dissemin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ao Zedong Poems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Mao Zedong; Mao Zedong Poems; concept; extension

(责任校对 朱正余)

<sup>①</sup>郭文亮:《为历史伟人而辩:毛泽东评价“争议”论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6期。

<sup>②</sup>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7月2日;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9年5月1日。